

以维护中华典籍为己任

——顾廷龙与图书馆

□ 王继凯

顾廷龙（1904—1998年）是我国著名图书馆事业家、版本目录学家。从早年传统文化的思想启蒙和投身图书馆事业，到革命战争年代对图书文化遗产的奋力保护，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对图书馆事业的集大成，这位20世纪的见证人，以中华文脉的守护者

为肇始，以66年的求索深刻影响着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程，并最终融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复兴事业。顾廷龙自幼浸润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在青少年时期即与图书馆结缘。他生于江苏苏州的书香世家，从四岁起即由祖父教读《四书》《五经》，并受家族金石图书之学的熏陶，逐渐形成对传统文化典籍的虔敬之心。1931年至1932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读研究生，容庚、郭绍虞、黎锦熙、顾颉刚等名家大师为一时之盛，激励着顾廷龙对国学图书的热情。

此时正值中国图书馆事业新旧转换，影响了顾廷龙的从业选择。1931年夏，蔡元培主持建成国立北平图书馆，一改历来藏书楼旧制，结合国情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为我国第一所新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及省立图书馆都受其影响，管理体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逐渐改观，出现新貌”。顾廷龙当时“负笈燕京，前往参观，洋洋大观，美不胜收”，对其选择从事图书馆事业产生很大吸引力。

顾廷龙在工作实践中立足于文化传统，以维护中华典籍为己任。他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担任校图书馆中文采编部主任，“以搜集、整理材料，作为一生办馆治书的方向”，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还创造性地进行馆藏书目的编纂，所编第一部书目《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以藏书的内容特点分为三卷，每卷又按经、史、子、集分列，对经史之加注重章氏题跋、友人识语、章氏移录前人题记少见者，间或加以按语，使读者一目了然，立即引起学界关注和赞誉，初步奠定了其在图书馆事业中的地位。此外，他还兼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虽力尽其责，但对哈佛意图购买中国珍稀古籍，则坚持内外有别，或自己设法或尽力游说燕大筹资制作复印本交予美国，使国内原刻本得以保存，拳拳之心颇为同仁感佩。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华战争，各地经年积累的无数珍贵图书文物毁于战火，顾廷龙深感痛心。他慨叹：“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能照常进行者，仅燕京大学图书馆一处，其他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而日、美等国，乘其时会，力事搜罗，致数千年固有之文化，坐视其流散，岂不大可惜哉！”

参与创办合众图书馆，终使顾廷龙一展保护传统文化之抱负。爱国藏书家叶景葵、张元济等同情国家劫难，时局紧迫，欣闻顾廷龙才志，遂力邀赴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主持馆务，“谋国故之保存，用维民族之精神”。顾廷龙欣然应允，“谓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亦可不负其平生”。1939年7月，顾廷龙抵沪担任合众图书馆总干事，具体承担起创办和主持各项馆务的重任，提出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建设一专门国粹之图书馆”，“以保存古书为职志，并当保存其式样，一以旧时度藏为主旨，略采现代之方法，不求形似而取得其实利”。其办馆思想得到董事会和社会各界认可，捐赠匡助者甚众，几年中合众图书馆藏书即达十几万册。他根据馆藏特点编印了各类书目，合起来即可展现合众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分开则能反映各家捐赠图书的特色，形成具有鲜明人文和学术内涵的书目版本系统，大大提高了馆藏资料的利用效率，迄今仍为古籍编目工作者参考，为文史哲学者提供引导和借鉴。为存亡继绝，顾廷龙十分重视编印图书藏书，使稀见典籍化身千百，以流传和弘扬中华文明遗产。他在《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中提出：“名人未刻之稿当为刊传，批本、

校本当为移录，汇而刊之……专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处于“孤岛”时期的上海合众图书馆，克服经费、人力等各种困难，陆续印成《合众图书馆丛书》一、二集，共十几种，为古籍传播作出可贵贡献。

顾廷龙冒险收集了大批革命文献。当时有关马列主义和共产党情况的书刊资料很难收藏，公立图书馆不会也不敢，普通私家一经发现则有杀头之虞。顾廷龙出于职业敏感，意识到它们具有珍贵的文献史料价值，所以在参与创办合众图书馆时就千方百计注意搜集保护这方面的书刊资料。抗日战争胜利后，顾廷龙冒着生命危险，秘密从贵州大学图书馆将一批革命文献转移至合众图书馆，藏于书架顶端与天花板接合之处。解放初期，中央宣传部曾派员到上海征集革命史料，他们在许多地方空手而归，却在合众图书馆觅得一大批珍贵资料，后作为北京图书馆的新善本永久保存，这是难得的历史远见。

新中国成立后，顾廷龙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图书馆事业迎来了光明前途。1953年，合众图书馆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后更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并入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出任馆长，新集图书馆事业之大成。

广泛收集抢救各类文献。顾廷龙从事图书馆工作以来，就以自己的学识和慧眼，抢救了各类稀有文献。如抗战以来收集宋卷达八千余种，后成为上海图书馆特藏。1955年，曾从废纸堆中抢救了大量很有价值的文献，并据此提出，收集文献的标准应当宽些，否则很容易与许多历史文献失之交臂。他总结了12大类型的收集范围：革命文献、档案、地方志、家谱、社团记载、个人记载、古代医书、账簿、迷信书、民间文艺、古典艺术、图片。还强调，要积极向社会宣传，重视图书文物的保存、积累和分类整理。这些思想对指导高品质、有特色图书馆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编制巨型古籍联合书目。一是编制古籍检索工具书《中国丛书综录》，共收录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全国41个大型图书馆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子目38891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1962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二是按照周总理遗愿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978年至1998年历时二十年完成，共收录全国781个图书馆等文化机构所收藏的古籍善本6万种，约13万部。该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研究贡献巨大，推动了其后一系列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的完成，成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联合目录和图书馆古籍整理成果。

倡导大量复制，使孤本不孤，代代相传。除提倡利用现代技术如缩微照相，对重要图书资料随手采集外，他极力主张大批印制古籍。在担任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馆长期间，先后主持影印30多种珍贵文献，或由上海图书馆石印，或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等合作影印，很多极具历史价值的文学、音韵、经学、数学、农学等孤本得以广行于世。顾廷龙还注重言传身教培养图书馆事业人才，其精神业绩深深感染教育了几代图书馆人。

顾廷龙经历不同时代，他在自传中说，新旧政权和军队，“两个世界，两个天地”的对比，无数事实说明：“党是真正爱护图书文物、保存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前程未可限量”。因此，1982年，顾廷龙以78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无数仁人志士的归宿，也是沧桑正道。



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立足现实、海纳百川、推陈出新，这是中华文明永葆生机和活力的重要保证。

充分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鼓励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多为文艺工作者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营造有利于出人才、出精品的好环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供孵化、推介、交流、展示的平台，充分激发创作者的积极性。同时，引领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脚踏实地的创作风气，鼓励生产经得起时代检验的文化精品，涵养风清气正、向上向善的创作环境。

建立科学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人才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最重要资源。要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特别是大胆起用青年人才，鼓励他们多创新、出精品，支持他们挑大梁，当主角；合理“育才”，注重在工作中引路子、出点子、压担子，通过多种方式为人才能提供发展的平台和保障，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条件；为人才钻研业务、提升能力创造良好的条件，改变传统的薪酬体系、绩效考评和激励机制，打破体制藩篱，鼓励优秀人才进入文化生产和服务领域，引导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形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塑造体系。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些伟大实践必将给文化创新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只有通过制度建设和生态培育，充分释放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新能力和创造智慧，让一切文化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一切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积极奋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不竭精神动力。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明清时期的北部边贸往来对于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以前，北部地区受地理地貌、文化民俗、战争频发等因素影响，边贸往来微乎其微。明清时期，北部地区出现了自秦汉以来的相对和平的历史性变化，边贸往来愈加密切，且逐步走向繁荣。明清两朝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措施，加强了与北方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从而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清朝也达到了相对鼎盛时期。

边贸政策强化了边疆族群对中央政权的政治认同。明朝吸收了元朝的灭亡教训，在其建立后，出于对自身的保护，实行严格的边禁政策，限制蒙汉贸易，并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隔绝边疆威胁。但随着国力增强和蒙汉双方经济需求增长，明廷逐步开放边市。一方面，明廷在北部边境（如大同、宣府）设立茶马司，以茶叶、丝绸换取蒙古马匹、皮毛，通过茶马互市达到“以茶驭番”目的。另一方面，朝贡贸易开始，蒙古部落的统治者可以向明廷贡献马匹以换取布帛、丝绸、茶叶等物资，与此同时，明廷默许民间百姓也能进行一定规模的日常生活物资的商品交易（私市），从而达到以经济手段拉拢蒙古部落的目的。这期间，俺答汗与明廷于1571年签订隆庆和议，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等地成为蒙汉贸易往来的中心。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一些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盟旗制度、驻防将军与边贸结合的边贸体系。同样是面临边贸与边疆安全的矛盾，明廷担忧蒙古通过贸易增强实力，清廷除了担忧蒙古还警惕沙俄渗透。因此，清廷以“大一统”思想重构边疆治理，通过盟旗制度将蒙古部落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并通过边贸往来强化经济联系。例如，俄罗斯与清廷签订《恰克图条约》，在恰克图设立边贸市场，蒙汉之间的经济往来更加密切。此举既有效防范了边疆动荡，保障了边疆安全，又通过贸易利益强化了蒙古部落对清廷的忠诚和认同。

明清的边贸政策使蒙古在经济上依赖中央政权，从而在政治上逐渐认同中央统治。例如，蒙古部落通过边贸获得经济利益，逐渐接受清廷的册封和统治。通过经济互惠，中央政权成功将蒙古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多元一体的治理目标。可见，明清北部的边贸政策成功强化了边疆族群对中央政权的政治认同。

边贸往来促进了跨区域经济整合。明清时期北部边疆的边贸往来在整合经济网络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贸往来推动了农牧经济的互补。蒙古草原地区相较于中原汉族地区而言，经济生活较为单一、生产方式较落后，以游牧为主业，但盛产马匹、皮毛、牲畜等畜牧产品，而汉族地区则是以农业为主，有相对先进的生产力，丰富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因而通过贸易，蒙汉既实现了互通有无，又促进了经济互补与共同发展。

边贸往来促进了跨区域的经济交流和社会分工的深化。边贸往来不仅强化了蒙汉地区的经济依存关系，还有效促进了跨区域分工，在长期的边贸往来中，中原汉族地区主要提供茶叶、布匹、铁器等手工业品，蒙古草原地区提供马匹、皮毛、牲畜等畜牧产品，东北地区则输出人参、毛皮等特产。这种分工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了边疆经济贸易一体化。

边贸往来极大地扩展了市场网络。边贸往来有效推动了区域性市场的形成。例如，归化城成为蒙古草原与中原地区贸易的枢纽，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张家口则是内地通往草原的重要门户。不仅如此，在清朝时期，形成了以长城关口为枢纽的贸易网络，如“走西口”“闯关东”“跑口外”等路线，连接了内地与边疆地区。而蒙古草原的畜牧业、中原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俄罗斯的皮毛业则通过贸易链条联结，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例如，晋商在蒙古建立“大盛魁”商号，将中原地区的茶叶、丝绸运往蒙古，再转销俄罗斯，通过“南茶北马、东丝西皮”的贸易链条，最终形成了横跨内地、蒙古高原、东北亚乃至欧亚大陆的经济网络，促进了跨区域经济整合。

边贸往来推动了文化交流与融合。明清时期北部边贸往来不仅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纽带，也是文化融合的重要推动力。通过长期的贸易往来与

明清北部边贸往来与多元一体格局

□ 王晓明

互动，内地与边疆族群在语言、习俗、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深层次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推动和巩固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

语言和文字方面的交流和融合。突破语言的障碍、进行有效沟通是边贸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在归化城和张家口等地，出现了以汉语为基础、夹杂蒙古语词汇的“贸易通用语”，这种语言也成为跨族群交流的重要工具。很多中原地区商人逐渐学会了蒙古语，而蒙古商人也逐渐掌握了汉语，这种双语能力也促进了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而蒙古贵族和商人为了更好地参与贸易和管理事务，也开始学习和掌握文字，清廷更是在边疆地区使用满文和蒙古文进行官方文书的管理。这些行为和做法有效促进了多文字文化的共存。

习俗与生活方式的交融不断深入。边贸往来促进了内地与边疆饮食文化的交流。例如，蒙古奶酪、奶茶等奶制品通过贸易传入内地，成为内地汉人饮食的一部分；内地的茶叶、面粉、调味品则通过边贸进入蒙古草原，改变了蒙古人的饮食习惯。此外，在归化城等边贸城市，蒙汉混居的地区出现了融合双方饮食特色的“蒙汉菜”，如以羊肉为主料的汉式菜肴。服饰与日常用品的交流也很普遍。蒙古的诸如皮袍、皮帽等皮毛制品通过边贸传入内地，成为北方汉族冬季御寒的重要衣物。内地的丝绸、棉布则通过贸易进入蒙古草原，蒙古贵族和富裕牧民开始穿着汉式服饰，形成了蒙汉服饰风格的交融。与此同时，边贸往来也促进了节庆文化的融合。例如，汉地的春节、中秋节通过贸易活动传入蒙古地区，蒙古人开始参与这些节庆；同时，蒙古的那达慕大会也吸引了汉商参与，成为蒙汉共同庆祝的节日。在礼仪方面，蒙古贵族通过贸易接触汉地文化，逐渐接受了汉式的礼仪规范，如跪拜礼、宴请礼仪等。

宗教信仰的传播与共存。边贸促进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和内地的传播。蒙古商人将藏传佛教的经典、佛像带入内地，而汉商则将这些宗教物品带回蒙古草原。清廷支持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将其作为巩固边疆统治的手段。例如，清廷在蒙古地区修建了大量藏传佛教寺庙，吸引了蒙汉信徒。汉族地区的信仰也在蒙古地区逐渐扩散。汉族地区的天帝信仰、土地神信仰通过边贸活动传入蒙古地区。例如，晋商在蒙古草原修建关帝庙，作为商业活动的保护神，蒙古商人也逐渐接受了这些信仰。在归化城等边贸城市，蒙汉信徒共同参拜关帝庙、城隍庙，形成了多元信仰共存的局面。边贸也促进了宗教艺术的融合。例如，蒙古的唐卡艺术与汉地的绘画技法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绘画风格；汉地的建筑技术也被用于修建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

明清边贸往来表明，经济互动是文化融合的重要推动力。通过贸易活动，各民族在语言、习俗、信仰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相互影响，实现了深层次的交流与融合，为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